

1950年代台灣反對黨議題的形成與發展：跨域視角的分析

• 任育德

摘要：隨着近年「雷震案」官方檔案資料逐步公布，相關歷史基礎資料漸趨豐富，有助深化1950年代台灣反對黨議題研究的學術研究成果。本文運用公私資料(含檔案、日記、回憶錄)及既有研究成果，檢視在文化冷戰中，文化及政治的結合如何表現在台灣反對黨議題的形成與發展，雷震、殷海光、胡永祥、左舜生等台灣、香港自由派知識人如何透過《自由中國》、《祖國周刊》、《聯合評論》等刊物參與討論、表述相關知識，形成跨域討論的現象。台灣地方菁英從實際經驗層面出發，發揮將議題落實的重要作用，美國隱身在後扮演理念推手角色。本文發現，透過跨域視角更能呈現台港自由派知識人交流、分享及營造言論思想交流空間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自由中國》 反對黨議題 雷震 文化冷戰 跨域討論

有關戰後台灣反對黨議題的歷史研究，從1980年代後期張忠棟的先導性研究開始，隨着檔案史料逐步公開，陸續出現質量兼具的研究成果^①。研究的分析角度也加入冷戰外交、美國視角，如外交史學者前田直樹注意到美國官方在「一中一台」政策產生及維持上所扮演的媒介角色，以及美國在「雷震案」上採取的消極態度^②，為台灣政治發展研究引入美方視角。此外，透過文化冷戰觀點，分析冷戰時期美國半官方民間機構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對台灣、香港或東亞文化、政治活動的支持，也頗見研究成果。例如，王世

* 本文在筆者既有研究的基礎上以新角度、新史料進行討論，初稿〈雷震與反對黨議題的形成與發展：從美國因素角度分析〉在財團法人紀念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主辦的「被遮蔽的燭光：殷海光先生百歲紀念國際研討會」(台北台灣大學文學院，2019年9月27日至28日)發表。感謝評論人蘇瑞鏘教授、主持人顧忠華教授建議，再承蒙二位匿名審查人提出建議修正方向，謹此致謝。

榕、官有垣注意到亞洲基金會資助故宮博物館興建台中霧峰的文物展覽館以展示文物；單德興關注亞洲基金會運用美援，在台建立文藝體制及舉辦學院活動；黃克武探討個別知識人與美國情報機構的接觸；金若杰 (Roger B. Jeans) 闡釋美國中央情報局 (CIA) 建設的外圍組織在亞洲「第三勢力」運動中的活動網^③；王梅香提出台北美國新聞處 (USIS) 以「隱蔽權力」方式在台灣和香港生產文學作品，創造台港、東南亞和自由世界的反共共同體，以及中介機構如何對在地文化生產從贊助到介入的觀點^④；傅葆石結合檔案與香港相關口述歷史，專門研究文化冷戰中亞洲基金會對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品的支援^⑤；容啟聰注意到 1949 年後居港民主社會黨 (民社黨) 人對台灣政情發展的關注，企盼實現民主社會主義理念^⑥。

前述成果都提醒研究者，探討冷戰時期台港兩地的文化、政治活動，從議題發想到發展的過程中，納入跨域視野相當重要。所謂「跨域」，即注意到在美國支持之下，台港自由派知識人如何使用中文書寫、閱讀及討論相同議題，如何互動並引發台灣當局回應，美國政府如何反應等，都是不容忽視的課題。若以反對黨議題進行跨域觀察，可補充以往討論未竟之處。因此，本文嘗試從此一面向切入，根據公私資料 (含檔案、日記、回憶錄) 及既有研究成果，就議題發想、跨域討論形成到台灣本地討論，在呈現歷史幽微之處的同時，更形深化相關議題的研究。

一 台港反對黨議題的合流和台灣當局的回應

1940 至 1950 年代間，中國大陸自由派知識人着重討論何為民主自由，從而初步闡揚「反對黨派的自由」，如胡適強調陳獨秀主張的「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⑦。但是 1950 年代前期，在「擁蔣反共」基礎立論的前提下，所謂「反對黨」既未打算取得政權，也未將制衡執政黨視為目標，因而有一定的局限性^⑧。台港自由派人士顯然將反對黨的存在視為自由民主與否的重要檢驗指標之一，但如薛化元指出，這種目標僅是「靜態性的描述」^⑨。

在 1949 至 1954 年間遷台初期，蔣介石正需要獲得美國支持，確保台澎金馬 (台灣、澎湖、金門、馬祖) 防衛安全，因此允許吳國楨、王世杰等自由派人士參與政治，以營造民主改革形象。曾任政治協商會議副秘書長、行政院張群內閣政務委員的雷震也在此背景下扮演國民黨與民社黨、青年黨之間的協商交涉者，並於 1949 年 11 月在台灣創辦《自由中國》雜誌。在尋求與香港自由派人士合流的目標下，1951 年 1 至 3 月間，雷震曾與洪蘭友赴港和反共人士會面，探聽「第三勢力」活動，參與由台港自由派人士創辦的香港政論刊物《自由人》^⑩。雷震復因向台灣當局轉達香港自由派人士有關台灣廢止具有一黨專政意味的諸措施 (包括軍隊建立黨部及學校教授三民主義) 的建議，經蔣介石批示：「殊違本黨之意志，而且昧於大勢，希由張〔其昀〕秘書長面加告誡。」^⑪

事實上，《自由中國》發行後，除得到華僑、民間友人贊助外，因倡議自由民主、符合亞洲基金會創會宗旨，故雜誌社從 1952 到 1959 年間獲得該會贊助，得以寄贈亞洲華僑閱讀^⑫，也使雷震得以建立與美方溝通的渠道。殷海

光是《自由中國》編輯委員中「少壯派」的重要人物，透過在台港密集發表文章，成為時人所謂「今日台灣文化界中後起之秀」，「思想比之若干『五四』健將為開明而進步」^⑬。殷海光常在香港《民主評論》雜誌發表文章，另由張國興在香港主持的亞洲出版社發行專著《邏輯新引》，再經東方出版社引進台灣銷售^⑭。當時香港的言論環境較台灣寬鬆，台灣自由派人士在香港出版論著和發表文章，有利台港自由派知識人的文化及政治意見交流。

隨着蔣介石在遷台初期任用改革派人士，雷震從參政者轉為議政者，這一時期他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就是1954年12月在香港《祖國周刊》雜誌發表的〈反對黨與民主政治〉一文^⑮：

因為在民主政治的時代，政黨要攫取政權，非以暴力為依據，而係以政策與主義為基礎的。因此，各方面必須努力宣傳政見，博取民眾的同情，使民眾了解各方爭論之重點，然後依據投票的方法，決定把握何種政見的人來組織政府。……在民主國家，人民乃是依據自由意志而定問題之取捨，不像在共黨統治之下，人民只是一個應聲蟲罷了。

雷震為甚麼會選擇在《祖國周刊》公開發表此一言論？在順應台港自由派人士就自由民主相關議題進行意見交流的同時，是否有其他意涵？

余英時曾分析，《祖國周刊》在1953年1月創刊，由友聯出版社發行，是香港「第三勢力」主辦的期刊之一，設定讀者為一般知識人，保持反共、自由、民主、人權的刊物基調，更重視中國傳統人文精神，因此在文化態度上兼有《自由中國》和《民主評論》之長，更具開放性。該刊從1953到1959年取得台灣核發內銷許可^⑯。友聯出版社在往後二十多年間建立跨國出版帝國，擁有自己的印刷廠，出版叢書、雜誌，也成立專門機構收藏有關共產中國的研究資料^⑰。研究者相繼指出，友聯出版社和《自由中國》在符合亞洲基金會宗旨、理念下獲得程度不等的資助，擁有「美國的保護傘」，為其不受國民黨方面藉着財務資助以拉攏、收編刊物，左右刊物方針的底氣所在。亞洲基金會擁有經費贊助者、美國價值捍衛者（反共/非共）、宣傳網絡建立者等多重角色，是官方與民間、政治與文化，文化生產與消費的中介^⑱。因此，台灣當局也注意到刊物背後的贊助者美國，既懷柔香港的自由派勢力，也不忘警戒發自香港的聲音及信息，擇時發動言論攻勢^⑲。

1953年7月間，CIA一份資訊分析報告指出《祖國周刊》與《自由中國》讀者群的互補作用：前者言論親「第三勢力」，以大學生、中學生為主要讀者，由陳濯生主編；後者言論親國民黨，由胡適主持，縱使傾向意識理念討論，也常以理性態度批評時政，作者大多為胡適的學術界友人，論調嚴肅^⑳。有研究者注意到，1954年接任《祖國周刊》主編的胡永祥作風務實、包容，迎合友聯出版社的主力客群，與同理念刊物相互支援。胡永祥從1956年起更參與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擔任幹事會幹事，實際上充當凝聚自由派知識人的角色。他們雖然反共，但有意識地和國民黨及其執政政權保持距離^㉑。胡適言該刊「反共有決心，言論有分量」^㉒。雷震從事聯絡各方的政治活動，重視香港及海外華人讀者意見，與同受美援的胡永祥合力營造台港自由派人士的

意見交流空間、互相支援，實屬自然。正因《自由中國》的存續，亞洲基金會扮演重要角色，雷震成為其他欲尋求美方資助的文化人的請教對象，如徐復觀即在1955年請雷震協助《民主評論》向該會爭取支持²⁴。

薛化元、任育德和中村元哉都論述了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國》和台灣當局從融洽、摩擦、緊張、分裂加深到破裂的互動關係變化。雷震和台灣當局均與美國在台外交系統接觸，但雙方對於是否要在台灣啟動政治改革、自由民主價值觀以及相關政治領導路線，存在明顯的價值取向分歧。前述雷震因轉達香港自由派人士的意見而遭受申斥，正是雷震和國民黨分手的關鍵²⁴。

薛化元指出，雷震在1954到1955年6月間申請訪美考察，並順道醫治眼疾，即使透過胡適出面力保，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幾次協助轉陳相關文件，政界的陳誠、俞鴻鈞和葉公超均認為雷震可以出國，蔣介石仍拍板下令不允許雷震出國，意謂雷震與執政者關係轉變，並陸續產生衝突。此事件還涉及USIS、總統府秘書長、外交部、美國駐台使館、胡適等方，美方去函外交部、內政部，但蔣介石仍決定不核發雷震赴美出境證件手續。在台灣當局亟需美國政治、經濟、軍事支持之際，此決定更顯特殊²⁵。執政者此舉顯係防範重演1954年吳國楨在美發言抨擊政府的事件，從胡適去函力保雷震「出國以後決不會發表毀壞自己國家與政府威信之事」一事可知²⁶。外籍記者、外交官仍會透過與雷震私下言談，獲知台灣反對人士的觀感意見。雷震曾向日本記者透露，如有機會去美國、去日本，「要把國府獨裁政治的危險加以說明」²⁷；雷震也曾向美國外交官表達觀感：當美國在軍事、經濟上援助台灣，也應予政治援助²⁸。顯然，雷震藉各種渠道提出建言，希求推動台灣政治改革。

台灣當局理解到執政者視雷震為潛在敵人，因此向美方反映不宜補助《自由中國》等刊物，從1956年7月25日USIS代處長馬康衛(Walter P. McConaughy, Jr.)在與雷震餐敘時言及，若由USIS購買刊物轉送外間，恐惹台灣官方不高興，即知一二²⁹。

二 台港反對黨議題的深化和反對黨的籌建

1955年前後，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國》已成為台港跨域討論的平台，不再拘泥「擁蔣反共」而轉為尋求「民主反共」，在反對黨議題的討論上也持續有進展。有關台灣反對黨議題的重要轉折，起自1957年2月在台新聞人牟力非發表〈略論反對黨問題的癥結〉一文。該文在重申反對黨對民主政治的重要性之餘，指出台灣要成立反對黨不應寄望執政者的「施捨」；現階段無法產生反對黨，固然與民社黨、青年黨內部不盡健全有關，也與政府及執政黨不熱心積極推進反對黨的產生及發展有關；執政黨必須回到憲政制度，去除自己「革命政黨」之想法，視自身為普通政黨；各政黨積極爭取民眾支持亦是關鍵³⁰。該文呼籲政治工作者重視台灣民眾，提出國民黨應拋棄「革命政黨」觀念、回歸普通政黨之說，在7月28日獲得雷震呼應：「國民黨不退為普通政黨，實力相差太懸殊，反對黨無法成長。」³¹

香港自由派人士同樣在「民主反共」前提下，着重關注各黨如何落實協商政治，具體表現在召開「反共救國會議」的相關討論，但在朝野互動不佳的情況下無從落實，也未見國民黨定案。雷震與《自由中國》樂見台港自由派勢力合作，不止一次呼應香港方面的主張，支持召開反共救國會議。1957年「五二四」反美事件在台北爆發後，雷震與《自由中國》呼籲政府進行政治改革，並未獲得實際回應，眼見反共救國會議不可能由官方召開，於是另闢討論，提出建立一個不急於執政的反對黨，成員可包括在野人士和部分國民黨開明派人士^⑳。

台灣本身有成立反對黨的需要，且有一定民意基礎。美國在社會民情、軍事層面對台灣的情搜分析及英國駐淡水領事報告都顯示，台灣民間的確存在反對執政黨的人群及不滿情緒^㉑。這也是國民黨在內部報告中強調以「疏導」、「加強國語教育」為紓解方案的背景^㉒。部分台灣在野人士從1954年開始呼籲地方民眾支持以「民選」抗拒「官選」、「本省人選本省人」等競選策略^㉓。這產生了同步效應：雷震等自由派人士憂慮台灣民間出現「地方主義」呼聲，故一度提出以反對黨主政來解決他眼中的台灣三大政治困難：財政、軍隊、台灣人^㉔。

1957年第三屆縣市長及省議員選舉後，雷震、《民主潮》發行人夏濤聲等人受邀參與台灣地方菁英召開的選舉檢討會，雷震當時已注意到台灣地方菁英有組織反對黨的動態，惟態度保留。甚至到1958年5月間接獲悉台籍在野人士楊基振預備組黨的訊息，雷震一度未予重視，並表示「必須內地人和台灣人合起來搞，以免有偏差」^㉕。這明確顯示台灣地方菁英在自身選舉經驗前提下提出建立政治組織的主張，尚未和居台大陸籍知識人的反對黨討論合流。但在尋求在野人士共識的心理下，雷震在1950年代後期即從態度保留轉為關注台灣地方菁英的想法，這的確為反對黨組成的構想增添新的空間。如蘇瑞鏘指出，廣義的、非典型的國家暴力壓制爭取組黨的台灣地方菁英，在討論反對黨之組成時不容忽視^㉖。雷震真正積極投入由台灣地方菁英主導、以贏得選舉為目的之中國民主黨，要到1960年蔣介石三連任總統事件之後（下詳）^㉗。

此外，雷震在1958年2月的〈反對黨問題〉一文中坦承，多數意見認為，強大反對黨的組成在當下欠缺主觀及客觀條件，最困難的就是找到和執政黨抗衡的實力基礎。但他話鋒一轉，談到反對黨組成並非依賴執政黨恩賜，而是反對黨自身奮鬥得來，奮鬥的方法之一就是選舉^㉘。以中央立法院層級而言，舉行定期選舉的意義重大，如政治學者張佛泉書信提議以「離鄉選舉」來解決中央民意代表無法定期改選的問題，一併推動政治改革。然而，台灣民意在政治制度層面無法終止中央民意代表的甄補，僅能展現於定期改選的地方級選舉。如雷震在〈今天的立法院〉所言，當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無法舉行，地方選舉終究會成為反對黨的活動場域^㉙。在牟力非開啟反對黨議題的討論端後，雷震結合理論與實務策略，意識到並思考落實選舉與反對黨實踐之間的關連，故此選舉即成日後《自由中國》的重要議題之一。朱伴耘在《自由中國》發表的系列文章，呈現了知識人逐步思考探索反對黨的性質，反對黨的目標從不思執政轉向要與執政黨平起平坐^㉚。

雷震持續着力於溝通各方菁英、爭取合作，由友聯出版社出版其專著《制憲述要》，與香港自由派勢力的文化系統加深交流。《自由中國》有關反對黨及

台灣政情的評論，成為香港自由派人士主辦的政論刊物所關注及討論的文本。雷震此時雖未在香港的刊物發表文章，但香港方面透過報導評論聲援《自由中國》，如在1958年談「政治反攻」、1959年談「陳懷琪事件」^{④③}。然而，台港自由派人士盟友關係的維持並不容易，一與彼此評價有出入有關，如1957年9月26日寓港文人徐訏稱：友聯出版社諸人「年輕有為，惜學力修養不夠，而在他們長成之中，多少受共產作風的影響，講求組織，耍花樣一類手法……」^{④④}二與雷震為規避台灣的郵件檢查，需透過美國、日本人士轉信「談要事」有關。台灣官方注意到台港自由派人士聯繫不絕，如友聯出版社透過美國外交郵袋將聯繫情資傳遞給《自由中國》雜誌社^{④⑤}，反映政府情治單位監控台港之間的聯繫渠道和跨域合作。在一次國家安全工作會報中，主席蔣經國更指明雙方的聯繫動機是「台港反動份子互相勾結呼應配合」，「國內外反動份子之終結〔極〕目的是在反抗政府」^{④⑥}。

從跨域討論、廣納意見觀點而言，為香港政論刊物《自由人》、《自由陣線》、《祖國周刊》等撰稿的左舜生，其籌辦的《聯合評論》周刊，正和《祖國周刊》在鼓吹「民主反共」的共識下相互激盪^{④⑦}。1958年8月15日，《聯合評論》創刊，號召跨域「大團結」^{④⑧}，至此增添一家在香港呼應《自由中國》和雷震理念的刊物。胡永祥在創刊號發表的〈把三個運動連結起來〉一文，指明「大團結」是跨地域的：台灣民主憲政運動的主張溫和正當，不該受到曲解；海外民主自由運動在東南亞的發展有助減低中國共產黨滲透擴散，也使香港成為擴散中國文化的政治重心之一。他明言：大陸的反共運動、台灣的民主憲政運動、海外的民主自由運動應及早連結、匯流力量^{④⑨}。隨後《聯合評論》或以「台北通訊」名義，或用專文分析台灣政情發展。研究者注意到，《祖國周刊》在持續報導介紹台灣政情發展時，表現出「知情權」，擺脫國共二元對立的思考框架，有助啟蒙香港人的政治意識^{⑤①}，與《自由中國》一同提供官方之外的思考方向。成長於國民黨訓政時期的作家王鼎鈞在日後指出，師長一再說「自由誠可貴，紀律價更高」，《自由中國》正好「有效的消解了犧牲、服從、效忠等觀念」，讓國民黨講求的「同舟一命、萬眾一心」成為笑柄^{⑤②}。台港的跨域討論營造出自由思考、保障人類基本自由權利的訴求以及反對黨的政治路線，加上美國贊助這些跨域討論的刊物，讓台灣執政者更感受到潛在威脅。

1959年2月至1960年3月，台港政論刊物熱烈討論蔣介石三連任總統的問題，主張民主改革。《自由中國》在1959年1、2月間發表社論〈欣幸中的疑慮——關於蔣總統反對修憲的聲明〉、通訊〈請看香港發出的台灣政治颱風警報〉，呼籲台灣各界注意「政治氣溫在劇烈變化」，要注意香港方面對有關憲政爭議的討論。《自由中國》6月16日的社論〈蔣總統不會作錯了決定吧？〉支持《聯合評論》同仁於5月15日發表的〈反對修憲〉、5月29日左舜生〈再談蔣連任問題〉一文陳述反對蔣介石三連任的主張。6月19日，左舜生在《聯合評論》發表〈搶救中華民國時間已經不多了！〉一文，表達反對蔣介石三連任，明言「要由蔣先生繼續幹下去，這一改革即根本無法實現」，引發國民黨方面在《中央日報》、《工商日報》撰文回擊^{⑤③}。

6月26日，左舜生在《聯合評論》發表的〈對於我們若干論點的澄清〉一文中補充陳述，表示《自由人》已遭查扣，無法內銷台灣。7月3日，他在〈再作

一番申述》一文再次回應外間意見，致使《聯合評論》繼《自由人》之後無法入台銷售⁵³。《祖國周刊》因刊登反對蔣介石三連任文章遭檢扣半年後，內銷證也遭官方注銷。部分台灣在野人士因「怕出事」，對《自由中國》編委會決定以發表社論來支持左舜生言論甚有不贊成的意見⁵⁴。雷震認為左舜生的文章雖未寫好，但有很多好意見。從1959年11月到1960年3月間，《自由中國》密集刊登有關修憲連任問題的文章，轉發香港及海外人士聯合簽署的〈我們對毀憲策動者的警告〉，並發表同名社論⁵⁵。在熱烈討論蔣介石三連任、檢討行憲現況、現實政治情境的同時，台港自由派人士在跨域討論中凝聚政治共識——「民主改革」，主張「反蔣」。

在國民黨進行各種政治操作以營造蔣介石三連任聲勢之際，朝野對立加深，蔣介石和雷震的互動關係呈現破裂局面。情治機構為此將雷震等反對蔣介石三連任的人士視為情搜的重點對象⁵⁶。1960年3月，蔣介石三連任總統，擺脫憲法連任約束，意謂法制內無法對政治強人進行權力制衡，組織反對黨及追求民主改革即具有正當性，也成為主張政治改革一方的最終共識。

3月16日，雷震與胡適商談，胡適明言對於「民〔社〕青〔年〕兩黨和國民黨民主派和台灣人合組反對黨」，他樂見其成，但自身處在無黨無派的角色，依然不願領導反對黨。5月25日，胡適再度提醒雷震和夏濤聲與台灣人「在一起」的重要性，這意味反對黨如要在台灣組成，台灣人的力量、意願及主動參與均是關鍵。在4月台灣舉行第四屆縣市長及省議員選舉前，雷震發表〈我們為甚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一文，正式主張「相信民主力量者」在選後組織強有力的反對黨，為下屆選舉作準備，才能實現名實相符的地方自治，並聲明反對黨的功用「就是要用選舉的方式以求獲取政權為目標」⁵⁷。雷震在選前參與李秋遠等在野競選人的助講，已表態要和台灣地方菁英在一起，日記中有「我希望國民黨以外的人多能當選幾個」，「我極力助國民黨以外之候選人」等語⁵⁸，這都回應了1959至1960年的台灣政局發展。

雷震的選舉論述從中央調整到地方，以因應台灣政局現狀，認為「相信民主力量者」自有台灣人士在內，不刻意標舉台灣人、大陸人，顯然是不希望相關用詞引發讀者戒心，也吻合雷震避免「地方主義」的心意。雷震關切選舉能否公平，也成為和台灣地方菁英合作籌組反對黨的共識基礎。余祺燁指出，台灣地方菁英想加入新黨，也是希望透過政黨力量，在地方選舉中和國民黨選舉舞弊的操作相抗衡；在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中，台灣地方菁英提供人力資源，大陸籍知識人提供思想資源，形成合作關係，也是同理⁵⁹。1960年5月20日，張佛泉致函雷震，表示全國性政黨不好組成，「政黨主要為競選，現在中央的代表均不改選，組黨亦無大用。故不如組地方性政黨」⁶⁰。這可確認雷震、張佛泉等人因應對當下情勢的思考，調整反對黨選舉策略與自我角色定位。

讓台灣地方菁英和自由派人士能夠合作的外緣因素，與美國對台外交方針有關。1959年，美國國會公布檢視現行亞洲政策的《康隆報告》(Conlon Report)，提出接納中國和台灣並存的事實，進行雙重承認；甘迺迪(John F. Kennedy)執政時期的外交智囊鮑爾斯(Chester B. Bowles)呼籲「重新考慮中國問題」。相對台灣官方媒體抨擊，《自由中國》平實引介，形同另類形式表態。國民黨於

此自有不安，台灣在野人士也嗅到現狀可能改變的氣味⁶⁰。1960年春季到夏季間，韓國、土耳其政潮致使政權輪替，反映反對運動有可能改變政局，從而激勵台灣地方菁英和知識人。政界中人也因此緊張不已，王世杰告誡雷震慎言，蔣廷黻也沉默以對。《自由中國》編輯傅正注意到：「對於在朝者，是一個嚴重的警告，對於在野者，則是一次有力的鼓勵。」⁶¹儘管亞洲基金會於1959年購書合約到期後停止補助《自由中國》，仍未改變殷海光、雷震等人要揭穿政府藉由反共之名行政治壓制之實（「黑暗統治的護符」）的共識⁶²。

1960年5月26日，《聯合評論》的督印人黃宇人寫信給雷震，建議以台灣為反對黨組黨的活動中心及總部，以「競爭選舉」和「應付當局」為中心任務；香港方面藉地理優勢側重「中共之研究」和「一般聯絡」；美國方面以「對外活動」和「爭取留學生」為主。三方各司其事，各籌經費，採少數有志者集體領導方式，期望擴大聲勢⁶³。國民黨在香港發動宣傳攻勢以壓制反對黨組黨論述，以「美國拿錢支持」造謠，再由香港左派媒體煽風點火，均訴諸民族情緒動員手段。胡永祥因此來信，建議雷震既久未幫《祖國周刊》寫稿，可藉機撰稿駁斥謬論；如雷震無法親自撰寫，也可委請他人執筆⁶⁴。這反映了在台港跨域討論下，香港自由派人士認可以台灣為反對黨組織的發展基地，並在香港發聲，持續彼此聲援。

自1960年5月起，雷震投入組織新政黨——中國民主黨——的運動，並欲破除「地方主義」及省籍隔閡。台籍在野人士邀請雷震參與5月18日選舉檢討會的活動。翌日，《自由中國》召開編委會會議，戴杜衡、夏道平、殷海光都不贊成雷震出面領導，惟雷震於會議中表達贊成該檢討會之意⁶⁵。21日，雷震向高玉樹強調，當下政治局勢是在野者不滿在朝者，絕非本省人排斥外省人。筆者以為，他期許高玉樹運用作為台籍民選政治人物的影響力，向各界領袖呼籲進行紓解⁶⁶。雷震在籌組中國民主黨巡迴全島分區座談時表達相同言論，既駁斥國民黨組織發布的新政黨將挑撥民眾情感的批評，也有意識地呼籲各地台籍在野人士，在爭取民主、選舉公平的大前提下共同合作，莫陷入分裂情境。雷震要求高玉樹促成各方人士團結，化除社會分歧，此舉更饒富深意。這樣的態度也流露在殷海光帶領台籍學生參與中國民主黨籌備會，學生私下詢問有關省籍問題時提出的意見中：他表示，一旦發生省籍衝突，願意為台灣人犧牲⁶⁷。雷震固然曾私下向人表示經費難籌，感歎「大陸人過窮，台灣人頗吝」⁶⁸，仍勉力以促成反對黨成立為目標，直到9月4日遭捕入獄為止。

三 美國的旁觀態度與台灣當局的壓制

當台港自由派人士在跨域討論過程中，從靜態地討論反對黨理念到朝向地方選舉具體路線，台灣當局即視之為競爭對手，動用黨政軍相關資源進行壓制，防杜意見影響力擴散。有關台灣如何動用情治機構監控，並由蔣介石下令逮捕雷震以壓制反對黨組成，眾多檔案及研究著作均已呈現壓制過程有計劃且執政者已考慮多時⁶⁹，此處不再贅述。本節將從檔案檢視美國、台灣當局對台港跨域合作及籌組反對黨輿論的態度。

楊秀菁指出，從雷震批評軍隊黨部、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開始，便陸續收到來自蔣氏父子所謂「共產黨唆使、幫助共產黨」的抨擊。國民黨沿用「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行顛覆政府之實的論述方式^①，這是官方抹煞台灣成立反對黨的核心論點。1957年12月，蔣經國在一場中央心戰會議中裁示要對《自由中國》有所對抗及反制：既然外間有不滿《自由中國》言論者，「若干讀者與群眾對彼等亦有鄙視與厭惡之情緒」，各單位應研究「如何發展此種群眾情緒，使該刊宣傳失去效用？」^②政府高層顯然想要消弭反對黨可能的群眾支持根源。

1958年2月間，蔣經國寫信給蔣介石，指出台灣面臨八大危機，前兩個危機「無形之匪諜心戰」、「紛歧錯綜之思想」就與思想意識有關。蔣經國認為問題起因雖不一，但都會導向國家陷入分歧危機，因此必須處理^③。同年12月25日，蔣經國在調查局會議中發表年終工作匯報，希望調查局人員研究除了蒐集情報，更要積極反擊，並以殷海光在台灣大學的演講為例：「我前兩天看到一件情報，殷海光在台大對三百多個台大學生講話，他講話的主要內容，是說我們的政權是一個獨裁的政權，我們沒有人權保障，他很明顯的提出來要打倒我們的政府，並且說最近這幾十年以來在思想上學術上影響最大的一個是陳獨秀，一個是胡適之，對思想學術有研究的人聽到他這種說法，當然感覺是一種很怪的想法，他對政府的攻擊有他的一套技巧」，認為情治機構要研究政治作戰技巧，「用甚麼方法把殷海光這種反動的思想打下去」。蔣經國直言，調查局如果「對付一個『自由中國』、一個雷震都對不過他的話，那我們怎麼能夠反攻〔大陸〕呢？」^④從上述言論顯示，蔣經國已視雷震、殷海光諸人為反蔣大將、思想大敵，情治機構必須反制，除去他們的議論在民間產生的影響力。

1959年10月，蔣經國明確向外事情報聯絡人員表示：台灣應防範中共派員滲入，刻意製造台美摩擦，協助取得台灣^⑤。其內在邏輯推演是：《自由中國》係美國勢力代言人，但為中共所用，威脅蔣介石政權。執政者要消弭危機，必須確認在美國文化冷戰宣傳戰略中，台港自由派人士共同營造的跨域主張，闡述基本人權、反對黨言論，是否能在執政者容忍限度內受到控制和運用？若是不能，即應消除美國在背後的支持角色，壓制台港跨域討論平台衍生的政治改革訴求和影響力。情治機構需審查平台內的言論，監控人員也不可少^⑥。

蔣介石的看法與蔣經國如出一轍，他注意到台港自由反共雜誌的討論議題及發展潛勢，認為台港反蔣者、「第三勢力」將與中共合流，藉民主改革瓦解統治，所以敵視可能的反對黨^⑦。在此脈絡下，雷震等人建言及討論反對黨議題，也就成為「陰謀」之一，受美國、中共幕後操縱；監控並斷絕台港聯繫和美方援助即為外交系統受命從事的工作之一。因為亞洲基金會在外有不欲與當地政府公開衝突的作風^⑧，在台灣當局持續向美方傳達不滿之際，1958年亞洲基金會即評估是否取消對《自由中國》的補助^⑨。

1956至1958年間亞洲基金會駐台代表史麟書(Earl Swisher)曾向雷震表示，該會工作要接受美國政府和當地政府的政策。《新生報》社長王民便質疑美國駐台使館為何叫USIS購買《自由中國》贈送他人。駐台使館政治事務參贊歐思本(David L. Osborn)表示，刊物是裝飾品，可以表示台灣有言論自由，有何不好^⑩？這都顯示政府動用官方相關渠道進行抗議，讓雷震注意到政府已視他及《自由中國》為敵^⑪，亞洲基金會已感受到台灣當局的施壓。

美國駐台使館履行職責，持續聽取台灣在野人士意見。1958年3月8日，歐思本與雷震會餐時，表示「美國的目的是要支持安定的政府」，要聽取官方、民間對立面臨轉折時的民間意見，雷震等人表示在軍事反攻不可能的情形下，宜推動台灣政治改革以帶動政治反攻^⑳。前田直樹指出，雷震所提的「政治反攻論」代表台灣不能固守以武力反攻大陸為基本國策，需要建立自由主義政府，以間接對抗共產極權政府^㉑。筆者以為，在此思路之下，雷震注重基本人權、反對黨議題，要求籌組反對黨以帶動國民黨開放政權參與、推動政治改革和思想路線發展，乃順理成章。但雷震訴諸政黨政治，自然讓台灣當局憂慮政權存續，懷疑《自由中國》文章鼓吹「反攻無望論」、「美國干涉內政論」，將不利於國民黨和蔣介石政權^㉒，也與美國要安定亞洲反共勢力的潛在目標衝突。美國駐台大使莊萊德(Everett F. Drumright)不支持《自由中國》的態度，終究會影響亞洲基金會的應對^㉓。這就是美國雖讓文化冷戰的跨域討論成形，惟在1960年9月「雷震案」爆發後選擇袖手旁觀並支持蔣介石政權，未對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表態支持的關鍵。

如前所述，1959至1960年間，反蔣介石三連任總統事件引發了跨域討論，台灣官方遂斷絕香港參與討論的刊物入台銷售，以阻絕言論影響力擴散。台灣鑒於友聯出版社成員參與反對蔣介石三連任宣言的聯署〈我們對毀憲策動者的警告〉，由外交部門向美方指控友聯出版社，指其受到美方指使發動反蔣輿論。1960年2月12日，美國駐台使館參事中「對華最友好的」葉格爾(Joseph A. Yager)向外交部長周書楷澄清，「所謂友聯社之政治活動為美國政府指使一節，純屬捏造」。針對周書楷「務盼美國政府能採取適當步驟」，以糾正亞洲基金會補助友聯出版社，葉格爾在13日回覆，據亞洲基金會駐台代表密勒(Richard J. Miller)表示，刊登相關文章的刊物乃個別的友聯出版社出版品。在部分政府中人眼裏，友聯出版社計劃聯署反對修憲連任的文章「措詞異常之壞，完全惡意」；轉載相關文章的刊物(即《自由中國》)也是「危害國家」^㉔。

2月18日，葉格爾再向周書楷表示，據美國駐港領事回報，友聯出版社四名成員以個人身份參加聯署，反修憲聲明活動委員會是由《聯合評論》相關人士組織，「美國總領事館現無任何證據可以說明友聯社利用其與亞洲基金會之關係，宣傳此項行動係受美國支持」。周書楷堅稱，美國只是因為時機尚未成熟，而未公開支持友聯出版社屬下的政治組織而已^㉕。檔案顯示，台灣隱晦指稱美國支援台港異議人士合流對抗政府，惟因不敢直指美國介入內政，所以改以外交渠道施壓以消去跨域合作平台(即可能主張籌組反對黨的輿論渠道)的潛在財務後盾——美方資助，可見在台灣對美外交辭令應答的背後，台灣黨政人士內心緊張。黨政、宣傳人士在一份聯名簽呈中，除論及友聯出版社與《自由中國》雜誌社的行動外，還建議「分化削弱」它們，疏導安撫其他台港異議人士，要有計劃地打擊友聯出版社和《自由中國》雜誌社，蒐集它們利用美援進行政治活動的資料，並提醒美方注意，意在爭取、分化反對黨的結盟對象^㉖。從1960年9月下旬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欲動員赴台作證，「但因未獲得雷〔震〕致港匪統戰原件作罷」^㉗，顯示部分黨政人士欲指控跨域合作和反對黨成立係接受外國勢力指揮之舉。

1960年9月4日，蔣介石下令台灣警備總部逮捕雷震等四人，隨後起訴並以軍法審判。《聯合評論》關注報導反對黨組織動態，也依理予以聲援^⑩。台灣外交機構接獲駐外使節在13、14、16日陸續回報，美國國務院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柏森斯(J. Graham Parsons)和中國事務局副局長盧德瑾(Larue R. Lutkins)以為「雷震案」雖純屬台灣當局的內部事項，美國無權干涉，惟「鑒於中美合作之密，而美對自由中國政府又竭盡全力支持，故不能不將美政府觀感密告」。國務院指明，「雷震案」將可能成為民主黨檢討對華政策的藉口，也可能影響聯合國代表權的討論，「自由中國在台確具民主制度基礎，雷案發生對國務院自為莫大打擊」。與此同時，美方也私下明確關切曾發言聲援雷震的高玉樹和李萬居安危。因此，台灣駐外人員提醒政府要「使外界獲得同情了解，並減少反感」^⑪。

9月20日，蔣介石話中有話地向黨籍立委表示，「國家的主權及國家的法律不能因任何理由而使其發生動搖，這是很重要的，不僅我們自己應隨時注意，保持其完整，也希望別的國家能夠予以尊重」，又在中央常務委員會藉機批評胡適「利用美國人等力量為不當」^⑫。先前韓國總統李承晚因選舉舞弊爆發發群眾運動而辭職，美國國務院發聲明稱韓政府造成和應付事件不當，莊萊德知道台灣高層認為「美國干預韓國政治」^⑬，其在10月7日遞交美國國務院的電報中分析「雷震案」，特別着重描述美方此時如不支持國民黨政權，將可能為美國在東亞的利益帶來致命性傷害，最後提出政策建議：現階段要一個穩定與能帶來軍事安全的台灣以阻止中共，既然防衛能力無法和「自由的政治氛圍」共存，美國最好的政治方案是「保持耐心地」、「部分地支持國民黨內、外漸進式與個別的政治改革」，以免給予中共機會分化美國與國民黨政權^⑭。

莊萊德評估美國不應妄動的關鍵，顯然因蔣介石成功控制軍權，迥異於韓國的李承晚政權。就誰能掌握軍權以維持政權穩定，成為美國可利用的同盟而言，此時支持蔣介石政權最符合美國利益，台灣在野勢力欲組織反對黨即無法獲得美方支持。柏森斯雖對台灣當局壓制台灣人政治願望不以為然，但仍同意莊萊德無需向台灣當局再行解釋及分析韓國事態發展^⑮。因此，台灣人要繼續發展和充實反對黨組織相關論述並付諸行動的時間，不得不再延後。美國選擇以時間換取政治秩序轉型，但如研究者所言，美方「遲遲未能展開對國民黨政權支援的檢討動作」^⑯，導致台港共同參與發起與營造的跨域討論空間因為台灣反對黨運動的失敗而受到打擊。

四 結論

本文針對1950年代台灣反對黨議題形成與發展的轉折，透過跨域視角指出，從大陸來台的自由派人士在議題思考與言說上扮演重要角色。台灣、香港知識人共同提供跨域討論平台、營造交流空間，台灣地方菁英則在行動組織活動上出力。台灣自由派人士在建立民主政治的前提下想像政治秩序和討論反對黨議題，從受限於「擁蔣反共」理念、提出不共不黨，進展到提倡「民主反共」而要與執政黨平起平坐，再隨着蔣介石三連任總統問題的討論，以及台灣定期舉行地方選舉的現實環境，衍生出以參與地方選舉競爭為目標的一系

列反對黨政治路線。1950年代雷震、殷海光等台灣自由派人士不管是在出版論著或發表刊物文章上，均作出實際參與及營造跨域討論空間的貢獻。胡永祥、左舜生等香港自由派知識人在參與討論的同時，也體認到反對黨議題的主要發展空間是在台灣。透過組織反對黨參與競選，投入體制內競爭，成為台灣自由派人士推動政治民主化的策略路線，該路線在跨域平台討論中形成。儘管面臨執政者長期採取壓制手段，其啟蒙之功終不可沒，1986年9月28日台灣反對勢力組織反對黨民主進步黨，並在2000年達成戰後首度政黨輪替。

1960年6月間，美國國家安全會議報告指出以香港作為自由世界前哨，加強香港作為美國資訊計劃基地，朝向華人區域宣傳共產中國面臨的問題有其必要^①。美國外交系統同意安排總統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出訪東亞，答允持續給予經濟與軍事的援助^②，肯定當時蔣介石政權的有效統治，無法為其他勢力在短期內替代，上述舉動再度確認美國係文化冷戰、「一中一台」政策的媒介。事實上，「雷震案」爆發後，美國選擇支持蔣介石政權，以時間換取日後政治秩序轉型，未予反對黨組織實際支援，確實延後了台灣政治秩序轉型的時間。台灣則在1961年7月1日至7日、8月25日至31日舉行「陽明山會談」，在不動搖國民黨政權的前提下展示修補朝野裂痕之意。

從上述《自由中國》、《祖國周刊》、《聯合評論》等個案顯示，文化冷戰下形成的台港、東南亞跨域交流空間雖遭到台灣執政者刻意壓制，但畢竟香港尚為英國殖民當局治下，為台灣當局實力不及，使自由派聲音保留一線生機。殷海光在台灣遭禁的書籍及政論文章，透過香港僑生協助出版；甚至如雷震晚年重寫《我的母親》，也是由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於1978年出版，這都是台港跨域交流的具體證明，值得持續深入探討。

註釋

① 張忠棟：《胡適五論》(台北：允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自由主義人物》(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0)；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年代台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板橋：稻鄉出版社，1996)；〈台灣自由主義思想發展的歷史考察(1949-1960)：以反對黨問題為中心〉，《思與言》，第34卷第3期(1996年6月)，頁241-86；任育德：《雷震與台灣民主憲政的發展》(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系，1999)；雷震：《雷震回憶錄之新黨運動黑皮書》(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23-66；蘇瑞鏘：《戰後台灣組黨運動的濫觴：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板橋：稻鄉出版社，2005)；江燦騰、陳正茂：〈五〇年代台灣組黨運動之重挫：記胎死腹中的中國民主黨〉，《北台灣科技學院通識學報》，第4期(2008年6月)，頁107-24；薛化元：《雷震與1950年代台灣政治發展：轉型正義的視角》(台北：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9)。

② 「雷震案」指雷震等人因《自由中國》的言論與中國民主黨的籌組而於1960年9月4日被蔣介石下令逮捕判刑的案件。參見前田直樹：〈台灣における政治的自由化と米國の冷戦政策—雷震事件への對應をめぐって〉，《現代台灣研究》，第30、31號(2006年11月)，頁94-111，該文增補為〈台灣的政治自由化與美國對台政策——從二二八事件到雷震案〉，載許雪姬主編：《二二八事件60周年紀念論文集》(台北：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台北二二八紀念館，2008)，頁463-85；前田直樹：〈戰後米台關係史研究から読み解く〉，載若林正文編：《現代台灣政治を読み解く》(東京：研文出版，2014)，頁177-209。

③ 王世榕：《第三部門：美國亞洲協會與台灣》(高雄：財團法人亞太綜合研究院，1997)；官有垣：《半世紀耕耘：美國亞洲基金會與台灣》(台北：台灣亞洲

基金會、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單德興：《卻顧所來徑：當代名家訪談錄》(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黃克武：〈顧孟餘的政治生涯：從挺汪、擁蔣到支持第三勢力〉，《國史館館刊》，第46期(2015年12月)，頁103-68；Roger B. Jeans, *The CIA and Third Force Movements in China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The Great American Dream*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8)。

④ 王梅香：〈隱蔽權力：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文學(1950-1962)〉(台灣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5)；〈冷戰時期非政府組織的中介與介入：自由亞洲協會、亞洲基金會的東南亞文化宣傳(1951-1959)〉，《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32卷第1期(2020年3月)，頁123-58。

⑤ 傅葆石：〈文化冷戰在香港：《中國學生周報》與亞洲基金會，1950-1970〉(上)、(下)，《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9年6月號，頁47-62；2019年8月號，頁67-82。

⑥ Kenneth Kai-chung Yung, "Cold War Currents and Chinese Émigré Intellectuals, 1949-1960", *Twentieth-Century China* 40, no. 2 (May 2015): 146-65；容啟聰：〈民主社會主義在冷戰香港：從理論闡述到參與本地政治〉，《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67期(2018年7月)，頁209-49。

⑦ 胡適：〈序言〉，載陳獨秀：《陳獨秀的最後見解(論文和書信)》(又名《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論文和書信)》)(香港：自由中國社出版部，1949)，頁11。現存該書在版本封面、書名內頁即有兩種名稱。

⑧⑨ 任育德：《雷震與台灣民主憲政的發展》，頁216；201-204。

⑩ 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頁353。

⑪ 阮毅成：〈「自由人」參加記〉，《傳記文學》(台北)，第43卷第6期(1983年12月)，頁14-15。

⑫ 〈中央改造委員會第一〇五次會議紀錄摘要〉(1951年4月16日)，收入「蔣中正電張其鈞中央改造委員會第一〇五次會議紀錄所附雷震洪蘭友建議廢止學校三民主義課程及軍隊中建黨部二點殊違本黨意志希面予告誡」，〈一般資料—民國四十年(二)〉，《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檔案/一般資料》，國史館，典藏號：002-080200-00345-045。

⑬ 馬之驩：《雷震與蔣介石》(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3)，頁113-20。亞洲基金會的前身為1951年成立的「自由亞洲委員會」(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是美國CIA文化宣傳心戰環節之一，1954年更名，從事文化與教育活動，為不對外公開的官方機構。約在1966年起，美國面臨民間壓力，CIA始逐步淡出該會人事與財務。因此這段期間的亞洲基金會是美國的「白手套」。參見"Memorandum from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o the 303 Committee" (22 June 1966),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4-68v10/d132>。

⑭ 或人：〈或齋隨筆〉，《工商日報》，1952年12月2日，第4版。

⑮ 龍一諤在《自由中國》讚譽該書實際功用是提供思想工具來「破除中共『動的邏輯』」，起「立正破邪摧陷廓清之功」。參見〈「邏輯新引」讀後感〉，《自由中國》，第14卷第9期(1956年4月1日)，頁29。台灣總代理資料參見〈自由與人權 邏輯新引廣告〉，《自由中國》，第15卷第5期(1956年9月1日)，頁30。

⑯ 雷震：〈反對黨與民主政治〉，《祖國周刊》，第8卷第10期(1954年12月6日)，頁7。

⑰ 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錄》(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142-44。

⑱⑲ 傅葆石：〈文化冷戰在香港〉(下)，頁67；70。

⑳ 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1951-1961)〉，《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2期(2009年11月)，頁241-56；王梅香：〈冷戰時期非政府組織的中介與介入〉，頁6-7。

㉑ 中村元哉：《中國、香港、台灣におけるリベラリズムの系譜》(東京：有志舎，2018)，頁183。

㉒ "Chinese Language Publications in Hong Kong" (1 July 1953), <http://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umentCIA-RDP80-00810A00160061006-1.pdf>.

- ⑲ 柴宇瀚：〈胡永祥與《祖國周刊》之研究〉（新亞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頁19-21、44；傅葆石：〈文化冷戰在香港〉（下），頁73。香港「第三勢力」各雜誌幾乎均互相支援，互登廣告，《自由中國》也刊登《民主潮》、《民主中國》、《祖國周刊》相關廣告。參見〈《祖國周刊》創刊號廣告〉，《自由中國》，第8卷第2期（1953年1月16日），頁28。
- ⑳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九卷（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頁438。
- ㉑㉒ 傅正主編：《雷震日記（1955-1956）：第一個十年（六）》，收入《雷震全集》，第三十八冊（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頁95-96；289-90。
- ㉓ 參見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頁76-176；任育德：《雷震與台灣民主憲政的發展》，頁68-89、156-68；中村元哉：《中國、香港、台灣におけるリベラリズムの系譜》，頁164-65。
- ㉔ 薛化元：《雷震與1950年代台灣政治發展》，頁160-77。
- ㉕ 萬麗鵬編：《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來往書信選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頁70；《雷震日記（1955-1956）：第一個十年（六）》，頁27。除雷震之外，其他反對人士如孫立人、殷海光以及1960年代李萬居身邊的親近人士都不能離台出境。參見孟戈：〈慎矣哉！莫播仇恨的種籽！〉，《聯合評論》，第245號（1963年5月24日），第2版；陳鼓應編：《春蠶吐絲——殷海光最後的話語》（北京：中華書局，2019），頁101-102。
- ㉖ 高木健夫：〈致蔣介石的公開信〉，《聯合評論》，第260號（1963年9月6日），第2版。1958年2月11日，高木健夫等人在台北與汪公紀、程滄波、雷震會餐，飯後進行討論。高木健夫當時屢盼雷震去日本，雷震寫道：「他不了解此地作風，我何能出境呢？他聽說黨部不登我們廣告，他十分驚奇。」2月下旬起，高木健夫在日本《讀賣新聞》為台灣之行撰寫連載專文，其中一篇以《自由中國》的出版證明台灣有新聞自由，《中央日報》在3月1日刊登中央社譯稿。參見《雷震日記（1957-1958）：第一個十年（七）》，收入《雷震全集》，第三十九冊，頁229、237-38。
- ㉗㉘㉙ 前田直樹：〈台灣的政治自由化與美國對台政策〉，頁471；471-72；471；479。
- ㉚ 牟力非：〈略論反對黨問題的癥結〉，《自由中國》，第16卷第3期（1957年2月1日），頁11-12、31。
- ㉛ 雷震：〈陸海安所寫黨外人士言談與事實不符——雷震致許冠三〉（1957年7月28日），載《雷震秘藏書信選：雷震書信集》，收入《雷震全集》，第三十冊，頁355。
- ㉜ 有關「反共救國會會議」，參見薛化元：〈從「反共救國會會議」到陽明山會談（1949-1961）——對朝野互動的一個考察〉，《法政學報》（台北），第7期（1997年1月），頁49-82；《雷震日記（1957-1958）：第一個十年（七）》，頁140-42。
- ㉝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FRUS)*, vol. 2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6), 381-83, 481; Robert L. Jarman, ed.,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 10 (Cambridge: Archive Editions, 1997), 646-47.
- ㉞ 台灣區產業黨部第一支黨部委員會編：《台灣農村專案調查報告》（台北：台灣區產業黨部第一支黨部委員會，1960），頁235-36。
- ㉟ 任育德：《向下紮根：中國國民黨與台灣地方政治的發展（1949-1960）》（板橋：稻鄉出版社，2008），頁408-10。
- ㊱㊲㊳㊴ 《雷震日記（1957-1958）：第一個十年（七）》，頁263、273；394；242；398。
- ㊵ 《雷震日記（1957-1958）：第一個十年（七）》，頁287、299。由胡適親自將楊基振起草的反對黨章程文件交給雷震，足見胡適對於反對黨動態的密切關注。立法委員胡秋原則鼓勵雷震當仁不讓，組織反對黨。參見《雷震日記（1957-1958）：第一個十年（七）》，頁324。
- ㊶ 蘇瑞鏘：〈「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的再思考——以台籍民選反對菁英為觀察視角〉，《台灣風物》，第68卷第2期（2018年6月），頁50-54。

- ③⑨ 范泓：《民主的銅像——雷震先生傳》（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236-37；薛化元：〈一九五〇年代台灣的政治改革主張——以《自由中國》為例〉，載台灣研究基金會策劃：《三代台灣人：百年追求的現實與理想》（新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頁393。
- ④⑩ 雷震：〈反對黨問題〉，《自由中國》，第18卷第4期（1958年2月16日），頁3-4。
- ④⑪ 張佛泉：〈民意代表任期問題原可以離鄉投票法解決——張佛泉致雷震〉（1957年7月16日），載《雷震秘藏書信選：雷震書信集》，頁350-51；雷震：〈今天的立法院〉，《自由中國》，第17卷第11期（1957年11月1日），頁7。
- ④⑫ 雷震：《雷震回憶錄之新黨運動黑皮書》，頁36。朱伴耘在〈反對黨！反對黨！反對黨！〉一文中，指陳「強大反對黨的存在是救國良藥」，並提問「今天何以台灣不能有一個強大的反對黨出現」。參見朱伴耘：〈反對黨！反對黨！反對黨！〉，《自由中國》，第16卷第7期（1957年4月1日），頁6-8。這是他撰寫七篇有關反對黨的文章的開端，這一系列文章成為1950年代鼓吹反對黨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他寫道：「反對黨能組成也好，風消雲散也好，問題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此地的情況下，除了澈底的民主政治外，還有甚麼比這更好的收拾人心的辦法！」參見朱伴耘：〈七論反對黨——代結論〉，《自由中國》，第23卷第5期（1960年9月1日），頁10。
- ④⑬ 胡越（胡永祥）：〈台北當局心亂如麻〉，《聯合評論》，第12號（1958年10月31日），第2版；左舜生：〈略論最近台北爆發的陳懷琪事件〉，《聯合評論》，第29號（1959年3月6日），第1版。
- ④⑭ 徐訏：〈烏籠思想與友聯手法——徐訏致雷震〉（1957年9月26日），載《雷震秘藏書信選：雷震書信集》，頁363。徐訏寫出此言，或因亞洲出版社和友聯出版社互相指控，使美方減少補助經費。參見《雷震日記（1957-1958）：第一個十年（七）》，頁336。王梅香另根據檔案指出，亞洲基金會內部討論後認為，受補助刊物可走向企業模式自給自足，讓補助政策從文化宣傳逐步轉向教育經營，使文化宣傳的補助減少。參見王梅香：〈冷戰時期非政府組織的中介與介入〉，頁136-38。
- ④⑮ 新新聞編輯部：〈雷震書信首度公開——第一部分：民國45年2月至46年12月〉，《新新聞》，第10期（1989年2月6日至19日），頁23、29；「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主任陳建中致外交部長黃少谷代電」（1960年3月14日），〈香港友聯出版社專案〉，《外交部/秘書處/參考資料及其他》，國史館，典藏號：020-130800-0036。
- ④⑯⑰ 陳世宏等編：《雷震案史料彙編：黃杰警總工作日記選輯》（台北：國史館，2003），頁31；11、30。
- ④⑱ 陳三井曾集中研究左舜生在香港的反共政論雜誌活動。參見陳三井：〈共識與歧見——論左舜生與蔣介石〉、〈蔣介石眼中的香港自由民主運動〉，載《八十年文存：大時代中的史家與史學》（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頁330-75。感謝匿名審查人的提點。
- ④⑲ 王厚生：〈張發奎在港希促成大團結，而「聯合評論」即以大團結為主旨——王厚生致雷震〉（1958年8月8日），載《雷震秘藏書信選：雷震書信集》，頁387。
- ④⑳ 胡越：〈把三個運動連結起來〉，《聯合評論》，第1號（1958年8月15日），第1版。
- ⑤⑰ 柴宇翰：〈胡永祥與《祖國周刊》之研究〉，頁107-108。
- ⑤⑱ 王鼎鈞：《文學江湖：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四》（台北：爾雅出版社，2009），頁105-106。
- ⑤⑲ 參見〈欣幸中的疑慮——關於蔣總統反對修憲的聲明〉，《自由中國》，第20卷第1期（1959年1月1日），頁7；方望忠（傅正）：〈請看香港發出的台灣政治颱風警報〉，《自由中國》，第20卷第4期（1959年2月16日），頁19；〈蔣總統不會作錯了決定吧？〉，《自由中國》，第20卷第12期（1959年6月16日），頁3；本社同仁：〈反對修憲〉，《聯合評論》，第39號（1959年5月15日），第1版；左舜生：〈再談蔣連任問題〉，《聯合評論》，第41號（1959年5月29日），第1版；左舜生：〈搶救中華民國時間已經不多了！〉，《聯合評論》，第44號（1959年6月19日），第1版。

- ⑤③ 左舜生：〈對於我們若干論點的澄清〉，《聯合評論》，第45號（1959年6月26日），第1版；〈再作一番申述〉，《聯合評論》，第46號（1959年7月3日），第1版。
- ⑤④⑤⑤⑥⑤ 《雷震日記（1959-1960）：第一個十年（八）》，收入《雷震全集》，第四十冊，頁125；292、295-96；313；117。
- ⑤⑥ 參見《雷震案史料彙編》，頁37-45。參與組黨的傅正被判處感化，也是因為他撰寫了兩篇反對蔣介石三連任的文章。
- ⑤⑦ 《雷震日記（1959-1960）：第一個十年（八）》，頁270-71、315；雷震：〈我們為甚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自由中國》，第22卷第10期（1960年4月16日），頁9。
- ⑤⑧ 余祺燁：〈1950年代台灣台籍菁英與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哲學碩士論文，2008），頁51、102-17。
- ⑤⑨ 張佛泉：〈組黨不如先組地方性政黨——張佛泉致雷震〉（1960年5月20日），載《雷震秘藏書信選：雷震書信集》，頁432。
- ⑥② 潘光哲編：《傅正〈自由中國〉時期日記選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1），頁306。
- ⑥③ 官有垣：《半世紀耕耘》，頁40；《雷震日記（1959-1960）：第一個十年（八）》，頁310。
- ⑥④ 黃宇人：〈如何由台、港、美共同促成組黨工作——黃宇人致雷震〉（1960年5月26日），載《雷震秘藏書信選：雷震書信集》，頁434-35。信件內容大要後來由黃宇人披露在〈談陪選及其他 答台北民主中國〉，《聯合評論》，第242號（1963年5月3日），第3版。
- ⑥⑤ 胡越：〈香港正對反對黨造謠，希為《祖國周刊》撰文申訴——胡越致雷震〉（1960年7月4日），載《雷震秘藏書信選：雷震書信集》，頁436。
- ⑥⑥ 參見謝漢儒：《早期台灣民主運動與雷震紀事——為歷史留見證》（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頁147-52；《雷震日記（1959-1960）：第一個十年（八）》，頁310-11。
- ⑥⑧ 許登源回憶道：「殷海光問我這個問題：『你們台灣人獨立以後，會不會把我們趕下海？』他說：『我們是該死，可是很多人都是無辜的，真正只是國民黨壞。』」參見薛化元訪談，楊秀菁、蘇瑞鏘等整稿：〈許登源先生訪談〉，《台灣史料研究》，第50期（2017年12月），頁159-60。
- ⑥⑨ 孟戈：〈建立思想體系與組織反對黨——讀完孫寶剛的今後的政策有感〉，《聯合評論》，第243號（1963年5月10日），第2版。
- ⑦① 任育德：《胡適晚年學思與行止研究（1948-1960）》（新北：稻鄉出版社，2018），頁284-96；薛化元：《雷震與1950年代台灣政治發展》，頁177-242。
- ⑦② 楊秀菁：〈權衡下的10年罪責：雷震案與1950年代的言論自由問題〉，《國史館館刊》，第40期（2014年6月），頁108。
- ⑦③ 「中央心理作戰指導會報主席指示事項」（1957年12月11日），〈民國四十六年各項會報指示〉，《蔣經國總統文物/文件/黨政軍文卷/國家安全與秩序》，國史館，典藏號：005-010206-00001-004。
- ⑦④ 蔣經國：〈稟父書〉（1958年2月），收入「民國四十七年二至十二月蔣經國稟蔣中正兒自服務黨國以來始終恭謹隱惡揚善之家訓目前局勢趨嚴重但必能轉危為安等手札」，〈民國四十七年蔣經國手札〉，《蔣經國總統文物/文件/專著手札與講詞/手札類》，國史館，典藏號：005-010502-00767-003。依據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蔣介石日記》，此信乃書寫於2月17日除夕。
- ⑦⑤ 「民國四十七年十二月至四十八年五月蔣經國對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工作同仁訓示演講稿」（1958年12月25日），〈蔣經國演講稿（三十一）〉，《蔣經國總統文物/文件/專著手札與講詞/講詞類》，國史館，典藏號：005-010503-00031-013。
- ⑦⑥ 「蔣副秘書長對情報外事聯絡人員訓詞」（1959年10月16日），〈蔣經國演講稿（三十）〉，《蔣經國總統文物/文件/專著手札與講詞/講詞類》，國史館，典藏號：005-010503-00030-005。
- ⑦⑦ 蔣介石：《蔣中正日記》，1958年3月28日。

- ⑥⑩ 《雷震日記(1957-1958)：第一個十年(七)》，頁235、256。史麟書直言亞洲基金會工作背後的權力關係，或與其在1958年7月卸任有關。官有垣引述新聞報導，指出亞洲基金會代表要「贏得當地政府與社會人士的信任與歡迎」。參見官有垣：《半世紀耕耘》，頁36。
- ⑥⑪ 現有檔案顯示，台灣當局最遲自1958年4月1日起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邀集行政、情治機構，成立《自由中國》雜誌審查小組，每月召開兩次審查會議，研析刊物不妥言論，彙集成冊後分送有關單位作為研議對策的參考，但找不到懲處刊物的依據。參見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1951-1961)〉，頁252。
- ⑥⑫ 參見傅秉常：《傅秉常日記：民國四十七—五十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頁286、549；「外交部周次長為友聯事約見美國大使館副館長葉格爾參事談話紀錄」(1960年2月12、13日)，〈香港友聯出版社專案〉。
- ⑥⑬ 「外交部周次長為友聯事再度約見美國大使館副館長葉格爾參事談話紀錄」(1960年2月18日)，〈香港友聯出版社專案〉。台灣政界之所以有此說法，來自《香港時報》創辦人許孝炎報告其與左舜生的談話內容。參見「許孝炎致陳建中函抄件」(1960年2月15日)，〈香港友聯出版社專案〉。友聯出版社發動聯署的說法，來自「中央社通訊參考消息」(1960年2月18日)，〈香港友聯出版社專案〉。
- ⑥⑭ 〈唐縱、陶希聖、陳建中簽呈國民大會前夕海內外政治情況分析與建議〉，收入「唐縱籌簽陳誠國民大會前夕海內外政治情況分析與建議」(1960年2月17日)，〈石叻叢書續編——友聲集下冊〉，《陳誠副總統文物/文件/石叻叢書/續編》，國史館，典藏號：008-010109-00011-004。
- ⑥⑮ 林秋敏等編校：《陳誠先生日記》，第二冊(台北：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頁1264。
- ⑥⑯ 關注反對黨組織報導，如宣平：〈警備總司令部擾亂新黨活動〉、聶磊：〈新黨在台中的活動〉，《聯合評論》，第103號(1960年8月12日)，第4版；黃宇人：〈為甚麼今日不能發揮抗日時期的合作精神？〉、大悲：〈陶希聖談黨禁與報禁〉，《聯合評論》，第104號(1960年8月19日)，第1、4版；李金擘：〈當權派底自存之道〉、宋寂：〈從一黨專政說到反對黨〉，《聯合評論》，第106號(1960年9月2日)，第1、3版。聲援雷震的報導，如左舜生：〈主張立即釋放雷震〉，李璜：〈蠻幹能將民間組黨禁止得了嗎？〉，《聯合評論》，第107號(1960年9月9日)，第1版。
- ⑥⑰ 「葉公超報外交部次長電」(1960年9月13、14、16日)，〈雷震案等〉，《外交部/秘書處/參考資料及其他》，國史館，典藏號：020-130800-0004。蔣介石曾指示唐縱，在雷震逮捕執行後轉告高玉樹、李萬居「雷案與彼等無關」(《陳誠先生日記》，第二冊，頁1258)。美國國務院在9月中重申不可波及兩人，顯然因為兩人發言聲援雷震而重申立場，並有試探台灣官方認定的內政界線之意。
- ⑥⑱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十一冊(台北：國史館，2015)，頁373；傅秉常：《傅秉常日記：民國四十七—五十年》，頁401、413。
- ⑥⑲⑳① FRUS, vol. 19, 724-25, 726-27; 737-38; 673-74.
- ⑥⑲⑳② FRUS, vol. 19, 726-27. 美國政治學者孟德爾不贊同該假設，稱之為「政治民主的迷思」(Myth of Political Democracy)。參見Douglas H. Mendel, *The Politics of Formosan Nationalis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89-121。
- ⑥⑲⑳③ 〈總統答覆美電視訪問 重申確保外島決心 匪如進犯我必反擊〉，《中央日報》，1961年6月21日。引自「總統蔣中正探望教育部部長梅貽琦病況、總統答覆美國國家廣播公司電視節目製作人賴恩斯訪問重申確保外島決心中共如進犯我必反擊，美國總統艾森豪訪華意義表明美真正承認我在亞洲之重要性」，〈總統事略日記〉，《蔣中正總統文物/其他/總統事略日記/總統事略日記》，國史館，典藏號：002-110101-00013-078。